

## 明清文化与文学研究·罗时进主持

### 作为方法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

“深邃是混乱的标志,真正的科学要将它转变为一种秩序(Kosmos),转变为一种简单的、完全清晰的、被阐明的秩序……将那种对深邃的预感改变为明确的、合理的构形,这是严格科学之新构造的一个本质过程。”<sup>①</sup>要建立起“严格科学之新构造”的思维秩序,既需要实证研究,也需要理论分析,这两者在方法论上有区别,但对于“真正的科学”来说,却是缺一不可的。

实证是基础性研究,其目的是搜集经验证据,考察基本事象,复原历史现场,发现客观史实。实证不但可以测知,而且应该能够验证,它是发现规律的前提,是理论大厦的基石。理论分析是将散状的感性经验提炼为系统的理性认知,对现象进行深入透视,从而抉发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与必然性,建立起知识结构完整的逻辑环节。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:实证研究要回答“是什么”,而理论分析要回答的是“为什么”。

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,何者难度更大?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和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都有画犬马难、画鬼魅易之说,理由是“就实”难,“向虚”易。这种“画法论”在艺术界颇生争议,如沿用到古代文化、文学研究中就极为扞格了。历史事实的“原态”多被遮蔽,研究者往往深感有一种“回不去的历史现场”,故“本相”难求。实证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,花费极大的心力,何“易”可言?至于理论分析,其非“向虚”之学,但有较为鲜明的“务虚”特征。应注意,务虚不是玄谈,既需要宏览博识的实证经验,同时要有理论思维、辩证方法、抽象能力。符合实践规律的理论分析是智慧的结晶,显然同样并非“易”事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,应有“实证”与“理论”双轮驱动的良好生态。当然对学者个体而言,往往在两者之间有所偏胜。对于倾注心力、具有开新意义的偏胜性成果,我们都应给予重视。

本期发表的年轻学者吕姝焱《清代虞山家集的编刊及其文化意蕴》一文,总体上是偏于实证的,其以田野考察方法总结并厘清“晚清民国虞山家集的存目及其时间分布”,颇见功力,为提炼、阐述“文化意蕴”,完整呈现“虞山百年诗学谱系与江南科举文化的演变脉络”建立了扎实基础。文中提及的“传统宗族框架下的家集亦吸纳大量闺秀诗作”现象,尤可注意。顺便提及,明清虞山文化博大精深,可以发现的文化、文学事象很多,在江南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,希望更多学者投入精力,进行深入探讨。

另一篇《末世光影:“同光体”诗人写“影”的心理与境界》是年轻学者王静与学术名家萧晓阳教授合作的论文。王静进入学界不久,便显现出英蕤才气,颇受好评。萧晓阳长期研究晚清文学流派,对包括“同光体”在内的流派都相当熟悉。本文显然以审美分析见胜,作者认为“同光体”诗歌的光与影映照出诗人忧伤与落寞的心灵世界。“时代趋向末世,历史的困境自然成为诗人的心理困境”“而一切光影修辞都是世态修辞,一切光影形态都映射出心灵影像”,如此有理论色彩的审美分析,值得品读。

<sup>①</sup> [德]胡塞尔:《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》,倪梁康译,第66-67页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1。